

第一章、緒論

「身體是兩面性的存在物，既負載著對最高權力的屈從，又負載著個體的自由。」¹

Giorgio Agamben

第一節、研究動機與目的

「現代自然科學和現代工業一起變革了整個自然界，結束了人們對於自然界的幼稚態度和其他幼稚行為。」²「生產力的這種發展，歸根到底總是來源於發揮著作用的勞動的社會性質，來源於社會的內部分工，來源於智力勞動特別是自然科學的發展。」³由這兩段 Karl Marx 對科學知識的評價，可見科技知識對人類生產力的提升有極大的意義。特別是 1990 年代以來美國在科技革命的基礎上，經濟持續增長，綜合國力更為提升，知識經濟（knowledge economy）的觀念應運而生，知識產權（intellectual property）成為各國積極推動與追求的目標。影響所及，大陸亦努力藉由知識產權以發展知識經濟。⁴本研究的目的即是探討大陸網路媒體（online media）如何建構知識產權觀念，而此一建構又對人構成什麼樣的張力，並進一步反思知識經濟時代下的身體政治學（body politics）。以下首先就此一研究的動機與目的進行說明。

一、知識經濟潮流下的中國

中國在改革開放後，逐漸融入知識經濟的大潮。一方面，在國際層面上，知識經濟是當前全球經貿活動的重要環節；⁵另一方面，在國內層面上，中國自鄧小

¹Giorgio Agamben, Daniel Heller-Roazen trans., *Homo Sacer: 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 (Stanford: California, 1998), pp119-159.

²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新萊茵報政治經濟評論」，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7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第 241 頁。

³Karl Marx, 資本論，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第 97 頁。

⁴劉樹成、張平，「新經濟」透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頁 8-10。

⁵知識經濟（Knowledge Economy）是聯合國研究機構於 1990 年首次提出的新概念。1996 年，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在其為題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報告中，進一步對知識經濟作了定義。據估計，現在世界經濟合作發展組織主要成員國的國民生產總值（GDP）的 50% 以上已經是以知識經濟為基礎。上述說明，請參見：王宇航，知識經濟與人才素質（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1999），頁 1。

平主政後，一直強調科技是第一生產力，主張科教興國。這兩種力量一直是推動改革開放的重要力量，同時也是改革開放的重要目標。這兩種力量作用的具體結果與代表性事件，即為中國在復關與入世上的努力。「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以下簡稱 WTO) 在 2001 年 11 月 10 日多哈召開的第四次部長會議審議並通過中國加入 WTO。從此在國際層面上，中國更加深刻的與知識經濟的國際大潮結合，並且在國內層面上，也必需落實各項入世的承諾，更加積極的推動知識經濟，以在國際經貿競合中爭強。⁶中國走入知識經濟的時代，確為當前中國大陸的重要面向之一。

而推動知識經濟的具體表徵與動力，即為知識產權的確立。⁷在國際規範層面上，加入 WTO，意味著大陸在經濟活動上，需遵守世界貿易組織協定(簡稱 WTO 協定)及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簡稱 TRIPS 協議)等相關條款，此二者均強調知識產權的保護與提倡；在國家發展層面上，知識經濟如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在其 1996 年，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報告中，作了如下的定義：「知識經濟是建立在知識和信息的生產、使用和分配基礎之上的經濟形式。」因此知識必需先商品化、資本化，才能納入市場經濟的活動中，凡此種種的首要之途，即在知識成果能夠轉為具體的產權，知識成果才能夠依市場經濟原則予以量化、核算、估價、交易，使得知識成果的歸屬與價值得到確定，進而得到保護與激勵。大陸為求加入國際貿易競合，現正大力推動知識產權，例如，大陸的「十一五」計畫即再次闡明應大力宣導、保護、推展知識產權的觀念。⁸胡錦濤、溫家寶、吳儀等中共領導人，亦反覆申明要發展「自主知識產權」、「創造名牌產品」以提高國家競爭力，指出「世界未來的競爭就是知識產權的競爭」。⁹因此，知識產權是觀察中國大陸知識經濟發展現況的重要介面。

知識產權對中國大陸而言，有如下的特殊性。首先，它是大陸政府當前大力推展與保護的重點工作。第二，知識產權是一種較新的產權觀念，中國其他生產要素的產權，均在中共建政後，經歷一個由集體化、國有化，再重新私有化的過程。但大陸的知識產權是在 1980 年代才開始進行立法，至 1990 年代末期及 21 世紀，基於更大幅度的參與國際經濟競合的需要才廣受重視。知識產權進入中國社會，與中國社會發生什麼糾葛，是一值得觀察的問題。第三，相較其他產權觀

⁶F. M. Ross Armbrrecht Jr., "Created in China Should Speed Its Respect for IP Rights," *Research Technology Management*, vol.48, no. 2 (Mar/Apr 2005), pp. 2-5.

⁷所謂知識產權是指人們利用自己的知識，用腦力勞動所創造的智力成果依法享有的一種權利，它本質上是一種特定主體依法專有的財產權，而且因其權利客體為人類在科學技術、文化等知識形態領域所創造的精神產品這一特性，而成為一種無形產權。馬豔、楊小勇、龔曉鶯，*知識經濟* (台北：揚智，2003)，頁 187-196。

⁸「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一五』綱要」，中國網，2006 年 3 月 6 日，<http://www.china.org.cn/chinese/2006/Mar/1156685.htm>

⁹國家保護知識產權工作組辦公室編，*保護知識產權幹部讀本* (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2005)，頁 6-26。

念而言，知識產權因其對應的知識成果為符號的形式，因此更依賴由法律符號來加以建構，國家機器 (state apparatus) 的介入更為明顯。¹⁰又基於符號的模糊性，知識產權既然是由符號來定義符號，是故必需反覆透過各種宣傳方式，以求得產權的澄清。換言之，國家機器與媒體的介入是經常且持續的。第四，知識產權是對應著以符號為形式的知識成果，而符號有易於廉價流通的特性，因此知識產權的觀念，易於對社會大眾的生活產生具體影響。

因此，大陸如何設立知識產權以迎接知識經濟的潮流，以及知識產權對中國社會的影響，是值得關注的現象。

二、知識經濟時代下人的處境問題

本研究關心的主題，是知識經濟時代的身體政治學，也可說是知識經濟時代人的處境問題，此一課題，在西方發達國家已受到相當的注意。在過去的經典研究中，大多關注資訊社會、後工業時代、資本主義發達社會的文化狀況，雖未必以知識經濟為名，也未必直接討論人的生存問題，但均提到了以知識、資訊為主要生產要素下人的處境，這些思考對於本研究問題意識的啟發，具有重要意義。

綜觀相關重要著作，對於知識經濟時代下人的處境問題，不外是樂觀與悲觀兩種期待，樂觀的看法認為知識經濟或訊息時代的來臨，將為人創造更多的可能性與能動性 (agency)。¹¹悲觀的看法則持相反觀點，認為知識經濟或訊息時代將對人造成更多的限制，導致人的發展一致化、片面化。茲分述如下：

在樂觀的主張方面，較具代表性看法如 Nicholas Negroponte 在《數字化生存》一書指出：工業時代是原子時代，是在特定時空中採取機器化、標準化的生產。而今日是工業時代之後的資訊時代，它是位元 (bit) 的時代，位元是訊息時代的 DNA，位元正迅速取代原子，成為人類社會的基本要素，決定了人們的生存。一切資訊均可數位化為位元，位元沒有重量，超越時空，易於複製傳播，可不受

¹⁰Louis Althusser 著，逢登迎譯，「意識形態和意識形態國家機器 (研究筆記)」，陳越編，*哲學與政治：阿爾都塞讀本* (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頁 320-375。Louis Althusser 認為凡是能夠執行國家職能的機構都可以稱它為國家機器。他認為政府、軍隊、警察、法庭、監獄等執行國家職能，可稱之為國家機器，而宗教、學校、家庭、工會、文化等機構，也同樣執行國家職能，亦可稱之為國家機器。國家機器可分為兩種，一是鎮壓性國家機器、一是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兩者的差別是：首先，鎮壓性國家機器只有一個，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卻有多個。其次，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統一的鎮壓性國家機器完全屬於公共領域，而絕大部分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屬於私有領域。但兩種國家機器的職能與目的均是為維護統治階級的地位，以及確保統治階級賴以為生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不斷進行再生產。

¹¹Jean-Paul Sartre 著，陳宣良等譯，*存在與虛無* (香港：三聯書店，1987)，頁 25。所謂能動性 (agency) 參考 Sartre 對存在的看法，是指人處於「自為存在」的狀態，即「人能夠是其所不是，且不是其所是。」，也就是否定與超越既定的意義結構的可能性。

時空限制進行生產，而且使用它的人愈多，價值愈高。即使位元可能仍以有形的原子為載體，但真正的價值在無形的位元。人經由傳遞位元，也取得跨越時空的特性。位元與資訊成為生產要素後，資訊時代的特徵將是真正的個人化，因每個人選擇不同的資訊、分享並參與資訊的創造，故人不再為物所役，自然與人、機器與人將由宰制關係走向和諧與互動的關係，這就人在知識經濟時代，人走上數字化生存後的樂觀前景。作者也同意，科技有其黑暗面，例如因位元易於複製，致知識產權被濫用，超越時空的新生產方式，致有些行業失業提高。但他認為數字化生存的四個特徵，將導致一切得到樂觀的發展。四個特徵包括：一、分散權力：即作為未來主要資源的資訊本身具高度流動性，將不再被壟斷，人人皆有機會分享資訊，發明創造。二、全球化：即資訊跨越時空進行流動，人們將跨越民族國家觀念所造成的資訊、政治、經濟的不平等分配，從而破除人為區隔彼此溝通。三、追求和諧：即資訊跨越時間的流動、溝通，將改變自我中心的觀念，使人們更加彼此理解與互賴，促成人與人、人與物的和諧關係。四、賦予權力：資訊即資源，在資訊流動共享下，更多人被賦予權力，人人都因此享有希望與尊嚴。¹² Negroponte 在《數字化生存》一書指出了知識經濟時代人類生存數位化後，因著資訊具有流動、廉價、變化、參與、互動、永續等特性，從而使人的生命也轉而具有這些特性，並在此一基礎上人與人、人與物的關係將得到和諧發展，個人的生命與群體的生活將因此更加多元、互賴。

樂觀看法的主要貢獻在指出知識經濟時代，人成為資訊的載體，使人的生命也隨之具有流動、廉價、變化、參與、互動、永續等特性，人也在此基礎上產生無限的可能性，並創造新的互動關係。但此類看法的主要問題在於：一、具有技術決定論的傾向，認為生產要素的資訊化是人類解放的前提，但訊息會不會異化，人會不會又重新成為訊息的奴隸，則無法保證。二、過於理想化的期待，人對訊息的享用能否真能公平，許多研究均指出，知識經濟時代，享有較高文化資本的人才能創造發明能力，才能真正獲利。但是否人人均有機會得到高水平的文化資本，或相應的軟、硬體條件，同樣無法保證。¹³三、個人主義下的套套邏輯。樂觀主義的立場，均以個人主義對人的定義作為人的完美本質，而今日的知識經濟本為個人主義社會氛圍下的產物，自然符合個人主義對人的建構，換言之，所謂知識經濟下對人的解放，是否僅是個人主義人學建構的進一步深化發展。

悲觀的看法方面，如 Daniel Bell 在《資本主義的文化矛盾》一書中指出，資本主義走入後工業社會階段將由高度一體化走向分裂與衝撞。該書主張當代社會具有分立和多原則支配的性質，社會具有三大對立的領域：首先是經濟領域，它是遵照效益原則，追求最大利潤，期許進步與享樂，但以分工制度，及隨之而來的生活片面化為代價。其次是政治領域，它遵照個人權利平等原則，追求最大參與，

¹²Nicholas Negroponte, *Being digital* (New York : A. A. Knopf, 1995).

¹³王孟平，*通訊革命*（台北：中華徵信所，1998），頁 138-149。

但以官僚機構日益擴充為代價，造成公眾與官僚間的矛盾。最後，在政治、經濟之上的文化領域則是遵照自我表達和自我滿足原則，標榜個性化、反制度化，但文化商品化，科技迷信，拜金主義？步步進逼，大眾文化一致性的走向與文化個性化的要求產生矛盾。對於社會分裂與矛盾問題，Bell 追蹤 Max Weber 和 Werner Sombart 的經典研究之後，認為促成資本主義精神的萌芽、發展的兩大動力是宗教衝動力與經濟衝動力，此兩者相互制約、作用。禁欲主義的宗教衝動力塑造了兢兢業業、精打細算的經營風格；冒險主義的經濟衝動力，造就了開疆拓土、征服自然的雄心壯志，兩者共同驅動資本主義的興起。並且宗教衝動力與經濟衝動力造就了文化領域的個性解放與表現自我。在此情況下，文化、政治、經濟間，形成表裡一致、相輔相成的發展。但今日經濟、政治、文化三者？呈現互相分裂與內部衝突，是因為宗教衝動力因為科技與經濟的迅猛發展而耗盡能量，無法平抑經濟的衝動力，致使萬物都失去神聖的色彩，人生失去終極的價值，社會走上世俗化，發展與變革即是一切，文化上陷於迷亂虛無，人生難以自我把握。雖然現代主義的文學與藝術意圖填補宗教缺位後的空白，但現代主義追求即興與衝動，力圖縮短審美距離，致缺乏深厚的文化底蘊，無法控制全局。後現代主義強調文化混雜與解構，更無法形成新的價值系統。針對此一文化問題，Bell 提出「公眾家庭」理論，意圖重建資本主義的文化，主張在追求經濟發展外，也應尊重傳統，顧慮將來，反對無節制的享樂縱欲，並願意為公眾付出。以避免資本主義步上古代文化由儉入奢，由團結走上紛爭的滅亡之路。Bell 由觀察西方的發展，指出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文化現象與個人處境，就是一個不斷變化、衝突、一致性與個人化並存的複雜情境。但 Bell 的最終理想仍是重建一套資本主義的宏大敘述，使分裂衝突的社會經濟、政治、文化，走上互相制約、和諧共存，以求資本主義能夠走上永續發展的道路。¹⁴

悲觀的看法中，相對於 Daniel Bell 不滿於後工業化社會的內部分裂，Herbert Marcuse 在單向度的人一書，則指出當代發達工業社會是新型的極權主義一體化社會，成功的壓抑人心中的批判性、否定性、神聖性，使人與社會成為缺乏反對立場的單向度局面。具體表現為政治立場的一致性，即不再有否定社會與採取革命立場的階級或政黨；生活方式的同化，例如不同社會階層看同樣的電視，遊覽同樣的風景，穿著相同風格的服裝；文化領域方面的同化，則是高層文化與現實等同起來，文化不再提供超越現實的高遠理想；思想領域方面的同化，則是實證主義、分析哲學的流行標示著單向度思考與哲學的勝利，思想與語言成為解釋現狀、將現實合法化的工具，它是一種順從性、肯定性的思維方式。但此一極權主義社會的成功在於它主要不是靠暴力與恐怖，而是靠無孔不入的傳播媒體對私人空間的滲透，並以生活物質富裕使人安於現狀，不求自由與解放。因此它的新穎之處在於它是一個讓人安然自得、舒服快活的極權社會。Marcuse 對於人能否恢復批判性進而求得解放不表樂觀，他認為那些社會邊緣人，亦即受社會一體化趨

¹⁴Daniel Bell, *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 (New York: Basic, 1976).

勢影響最小的人才有可能提出抗議，例如青年學生、無業遊民、或者是受迫害的其他種族。¹⁵

悲觀的看法除了上述二種立場外，Theodore Roszak 在《信息崇拜：計算機神話與真正的思維藝術》一書中則站在人道主義立場，強調人的思維與智慧不是資訊與電腦技行所能摹仿、替代。該書的目的是在不否定資訊與電腦重要性的前提下，探討它們的偏激與界線。本書指出以電腦作為操作工具的資訊，目前被誇大為能夠取代人的思維。一方面資訊具有不可見的特質，被視為包羅一切，無所不能，類似思維的創造性。二方面電腦具有大量儲存資訊的能力，具有依照嚴格邏輯處理訊息的能力，更是接近於人的思維功能。基於以上兩個原因，產生了資訊崇拜，造成思維與機器界線的混淆，思維有被機器取代的危險。本書作者認為資訊崇拜是學術界、實驗室、市場經濟三者合謀的結果。知識經濟時代中，人運用包括電腦在內的工具，成為資訊與知識的載體，而知識活動又商品化為經濟服務，但這不代表人、電腦、資訊、知識可以劃上等號或彼此替代，而更要注意人、電腦、資訊、知識是為了特定群體的權利服務。¹⁶

悲觀看法的主要貢獻在於指出知識經濟時代，訊息此一生產要素異化後對人生命的宰制，它可能造成文化的一體化或衝突化，其中如 Bell 與 Roszak 著重強調了即使在資訊的流動、滲透下，各個社會場域與人的思維仍不能簡單化約為訊息，它們之間仍有分裂與衝突。悲觀看法的主要問題，首先在於，均對人與文化懷有某種精英主義的期待，例如 Bell 反對文化的世俗化、Marcuse 反對文化失去理想性，Roszak 反對人的思維被簡單類比為機械，凡此均忽略了對人與文化的理想性期待，是否又是另一種文化權威的宰制與建構。其次，它們注重了知識經濟對人造成的宰制，而忽略了知識經濟下人可能因此而取得的能動性。

總之，樂觀的看法較重視知識經濟對人的助力，認為人是操控資訊的主體。悲觀的看法較重視知識經濟對人的阻力，認為資訊將建構人的生活。但他們也指出了幾個共同的問題：首先，知識經濟下的社會究竟會因符號流動而走向一體化、平等化，還是分殊化、等級化。其次，知識經濟時代下的人與符號能否互相化約。第三，上述兩個問題其實是在反思知識經濟時代下的人究竟是更加自由、自覺，還是更加侷限、蒙昧。這都是知識經濟攸關人類命運的重大議題，必須審慎思考。

三、研究目的

¹⁵Herbert Marcuse, *One dimensional man: studies in the ideology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 (Boston: Beacon Press, 1964).

¹⁶Theodore Roszak, *The cult of information: the folklore of computers and the true art of thinking* (New York: Pantheon, 1986).

基於以上，本研究認為，知識經濟為當前大陸社會的重要潮流，也是包括中國社會在內人類新的生活情境。突顯此一重要潮流的現象即為國家對知識產權的建構與宣傳，其中值得觀察的面向，即為黨國體制（party-state system）如何透過媒體提倡知識產權，並由此對人的生活進行介入。因此本研究的問題意識與研究動機即是關注知識經濟下人的處境問題。具體而言，即是思考權力意志在操作知識產權觀念時所建構的身體政治學。

目前對大陸社會身體狀況的探討，較多是在歷史的脈絡下研究特定群體的身體。例如，Gail B. Hershatter *危險的愉悅* 一書探討近代中國的賣淫現象，認為娼妓在文本中，通常是其他論述脈絡中的他者，這些他者如何被形塑、再現，可以反顯出各種論述的意圖。¹⁷ 其次是對中共在革命階段規訓身體的論述進行了探討，如黃金麟的研究，是由歷史的、社會的角度，探討現代性在中國的開展和演變，身體逐漸政治化的過程，以及對存活其中的人具有什麼樣的意義？關注的時間背景是在中共建政之前。¹⁸ 高華在其 *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 一書，著重探討了延安整風中，中共如何將人的身體政治化、符碼化，規訓為符合中共推動革命的權力意志。¹⁹ 至於改革開放後的身體狀況，例如流心的 *自我的他性：當代中國的自我系譜* 一書，對當前大陸某科技公司採取民族誌的研究，指出中國社會快速演變，導致中國人能夠很快的在性格上轉變為另外一人，流心稱此一人格上的斷裂，是一種自我的他性所致。²⁰ 因此本研究探討知識經濟時代，知識產權作用下的身體狀況，屬於較新的嚐試。將有助於瞭解中共政權如何透過傳媒、國家機器，透過知識產權的建構對身體進行規訓。

本研究將選擇若干網路媒體報導的案例，以研究國家對知識產權的宣傳與建構。選擇網路媒體宣傳活動的理由是：首先，因為網路傳播（internet communication）一般被認為具有去中心化、去公私邊界、快速流動、虛擬真實的特性，較能體現知識經濟時代符號數位化後，訊息快速複製與交換的狀況。²¹ 其次，網際文本（cybertext）兼具線性與非線性讀寫的特性，例如建立超連結的關鍵字，也是考察在知識產權議題上相關符號運用的參考指標。第三，相對於社會大眾而言，來自傳媒的宣傳報導，較法律、政策文件更為可親，具有較大的影響力。

¹⁷Gail B. Hershatter 著，韓敏中、盛寧譯，*危險的愉悅：20世紀上海的娼妓問題與現代性*（上海：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

¹⁸黃金麟，*歷史、身體、國家：近代中國的身體形成 1895-1937*（台北：聯經，2001）以及黃金麟，*政體與身體：蘇維埃的革命與身體*（台北：聯經，2005）。

¹⁹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相關研究亦可見：Kenneth Lieberthal, "The Great Leap Forward and The Split in The Yan'an Leadership 1958-65", in Roderick MacFarquhar (ed.) *The Politics of China: The Eras of Mao and De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 edition 1997).

²⁰流心著，常姝譯，*自我的他性：當代中國的自我系譜*（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²¹吳筱玫，*網路傳播概論*（台北：智勝，2003），頁 12-18。

在案例選擇上，本研究選擇了「王同億現象」、「漢芯晶片造假事件」與「爽歪歪商標爭議事件」等三個案例，選擇此三個案例的原因是：一、它們分別是屬於目前一般知識產權包含的著作權（copyrights）、專利權（patent rights）、商標權（trademark rights）的爭議事件，選擇這三個案例較能涵蓋此一研究主題。而在知識產權中也常被提到的不公平競爭與商業秘密問題，事實上是上述三種權利的補充，可以包含在它們之中，故不再另外舉例。²²二、上述三個事件發生在 1990 年代至 21 世紀初期，屬於最近的爭議性案件，且主要爭論意見於網路媒體均有呈現，較適合本文的主題。三、上述三個案例，均為爭議性事件，且涉及人的活動，較能呈現不同的主張與看法，進而有助思考在不同論述交織下，網路媒體如何建構知識產權，而又有那些論述立場參與建構，那些立場對身體又產生了何種張力。是故本研究選擇這三個案例，以回應研究的問題意識。

總上所述，研究目的為如下幾點：

- 第一、網路媒體中如何建構知識產權的相關事件。
- 第二、知識產權如何透過相關事件得到建構。
- 第三、上述的建構力量為何？以及它們的關係。
- 第四、國家機器、網路媒體在知識產權建構過程中的角色與影響。
- 第五、知識經濟經由知識產權、網路媒體對身體產生的作用。

本研究共分八章，第一章主要介紹研究動機、目的、文獻回顧與研究方法、研究可能的貢獻與限制。第二章就主要概念與分析架構作一說明。第三至五章分別探討上述三個案例，以回應上述第一與第二個研究目的。第六章闡釋國家機器的角色與論述的關係，以回應上述第三與第四個研究目的。第七章進一步思考人處在國家與多元論述張力下的可能處境，此為第五個研究目的，以回應本研究對於知識經濟時代下的身體政治學的研究旨趣。第八章則進行總結。

第二節、文獻回顧

目前研究大陸知識經濟下人的處境問題，大多是經濟學與法學的研究，少有文化方面的研究。以下分別討論，以見其梗概與異同。

一、經濟學方面有關知識經濟與人力資源方面的研究

經濟學方面的相關研究較多，經濟學研究大多是在計量分析的基礎上，依

²²吳漢東主編，知識產權法（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頁 1-5。

照學科典範所建構的客觀與冷靜，不帶太多好惡與價值判斷的立場上，指出中國知識經濟發展的現況，以及知識經濟對人力資源的需求。

對於知識經濟的大潮，大陸學者多主張要積極順應，因勢利導，並且要注意知識經濟以及與之相伴的全球化自由貿易隱藏的不平等危機。例如在劉樹成、張平，「新經濟」透視一書指出，知識經濟所帶來的大部分好處為發達國家所獲得，教育和知識不平等造成新的種族隔離。如 1999 年聯合國的人類發展報告提到全球貧富差距越來越大，最富裕的國家 20%的人口控制了全球國內生產總值的 86%，且富裕工業國家持有世界 97%的專利。²³知識經濟也促成跨國性的或全球性的宏觀經濟特別是金融市場不穩定，各國經濟互相依賴，互相促進，但互賴性提高，導致經濟、金融危機的傳導性提高。此一互賴性是不平等的，發達國家相對佔有優勢，導致利益少數人獲得，風險多數人分擔。知識經濟把人變為人力資源，人被商品化後，其生存權利與生命價值只能依賴於他創造資本的效率，這將造成人與人的不平等。²⁴即使如此，中國仍然必須要發展知識經濟，必須大力提升人才素質，國家和社會應營造更好的教育制度、激勵制度，以育人和用人，培養一批高素質的人才，參與國際競爭。²⁵因此，知識經濟對人的影響將是，第一，國家與社會更深刻的介入人的生命，以培養、調動其創新的積極性。第二，人的創新能力被資本化、商品化，人權的享有將和他的經濟表現掛勾，人將被片面化，變成為經濟進行創新的工具。第三，隨著人的商品化而來的是人類在國內與全球環境中將更加不平等。

除了強調知識經濟全球化的危機，以及對人的可能影響外。也有學者指出中國本身的條件的問題，認為中國要大力培養人才，解決人民間的知識鴻溝，才能讓中國利用知識經濟追趕先進國家。較重要的如胡鞍鋼在其主編的知識與發展：21 世紀新追趕戰略提到大陸面臨一個中國四個世界，與一個中國四種社會的發展情境。所謂一個中國四個世界是指與世界各國互相參照下，中國可分為四類收入組，分成四個世界。第一世界如上海、北京、深圳等，為高收入發達地區，佔全國總人口的 2.2%；第二世界是大、中城市，即沿海地區，為上中等收入地區，佔全國總人口的 21.8%；第三世界是下中等收入地區，佔全國總人口的 26.0%；第四世界是中西部貧困山區、少數民族地區、農村地區及遙遠地區等為低收入地區，佔全國總人口的一半。另外，所謂一個中國四種社會，是按就業人

²³即使以最近的數字來看，大陸 2006 年 R&D 經費支出占 GDP 的 1.41%，而 2004 年台灣為 2.44、南韓為 2.85、美國為 2.68、日本為 3.13，投入相對仍低，落後其他國家，難以支撐知識經濟產業的快速發展。可參考：「中華人民共和國 2006 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2007 年 2 月 28 日，

http://www.stats.gov.cn/tjgb/ndtjgb/qgndtjgb/t20070228_402387821.htm。

「主要國家之研究發展經費」，中華民國經濟部，2007 年 3 月 17 日檢索，

<http://2k3dmz2.moea.gov.tw/GNWEB/Indicator/reports/A22.xls>。

²⁴劉樹成、張平，「新經濟」透視，頁 348-368。

²⁵劉樹成、張平，「新經濟」透視，頁 250-251。

數所佔比率劃分出四種社會，如此大陸可分為農業社會，即大陸的農業勞動力佔全國總人口數 50%；工業社會（包括建築業），其勞動力佔 23%；服務業社會，即傳統服務業就業比重為 22%；知識社會（包括教育、衛生、文化、科技、金融、保險等），其就業比重佔 5%。因此大陸的一大挑戰是要在差異性極大的社會經濟環境下進行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化、知識化。²⁶

在內、外壓力下，胡鞍鋼指出中國必需利用經濟全球化的條件在某些方面實現跨越式發展，把其他發達國家經歷幾百年的時間所完成的成績，在較短的時間內逐步完成。因此要使經濟和制度體系對現有知識加以高效利用，以促使創新體系中的企業、研究中心、大學相互作用，透過政府與企業的投資以激勵現有負責 R&D（研究與開發）的科技人才，使之成為知識與技術的創新者。具體而言即加大政府對 R&D 的財政投入，鼓勵企業對自主創新的投入，使企業成為創新主體，並確立 R&D 的優先投資領域，建立知識創造財富的社會風氣。除了調動那些既有的高素質人才的積極性外，也要擴大全體公民收吸知識的能力，但因中國人口龐大，且中國一向由政府來支持教育，以致大陸是「窮國辦大教育」，陷入稀缺的公共教育支出與巨大的教育需求間的矛盾，特別是高等教育方面矛盾更為嚴重。因此胡鞍鋼認為應該鼓勵社會投資教育，以解決教育資源問題。此外，也要加強基礎設施、通訊科技，使其足以推動資訊的高效傳遞、傳播和處理，以擴大公民對知識的交流。經由以上的努力，讓中國成為學習型社會、普遍應用技術社會和信息社會。此外，針對一個中國四個世界與一個中國四種社會的困難處境，胡鞍鋼指出，中國存在極大的知識貧困狀態，知識鴻溝存在於區域、城鄉、性別之間，西部和少數民族地區、鄉村地區、女性在教育和獲取資訊的機會上均處於弱勢，因此必須改變過去重視硬體投資的扶貧政策，應重視軟體方面的投資，即應以提升知識為主。²⁷在此，可以看到幾個問題：第一，中國在知識經濟的判準下，全國呈現高度不均衡。第二，政府、社會仍應加緊投入。第三，全社會將被動員，以求利用知識經濟趕超先進國家，高級人才被激勵，一般人民受教育，困苦人民求脫貧，但顯然一時之間，人仍將因為他在知識經濟中的表現，而呈現不平等的狀況。

既然知識經濟的發展是以創新為根本動力，則大陸以其作為一個後進國家，如何產生創意，並與發達國家競爭，即是一個重要課題。路風在其走向自主創新：尋求中國力量的源泉一書，經由研究若干創新案例後指出，1950 年代因中蘇分裂和西方世界的封鎖，曾走上自力更生為主的道路，今天大陸工業的技術能力更多地是起源於那個歷史階段。改革開放開始之後，中國與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產生了引進技術的巨大需求，特別是進入 1990 年代後，中國工業越來越多地滑向沒有自主開發內容的技術依賴道路。但據他的研究發現，那些具競爭力的成功企

²⁶胡鞍鋼主編，知識與發展：21 世紀新追趕戰略（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頁 3-5。

²⁷胡鞍鋼主編，知識與發展：21 世紀新追趕戰略，頁 217-235。

業多是自主開發技術的企業。因此路風主張技術能力是組織內生的，所以技術引進永遠不能代替自主創新，中國應在政府的引導下，利用大陸本身的廣大市場為自主創新創造無限機會，藉由自主創新，才能保證國家安全和政治獨立。至於如何讓創意自組織內產生，這又必須回到組織中的人力資源了。路風指出知識創新具有很強的累積性、緘默性，即創意很難立刻移植使用，通常要經過長時間的學習積累，潛心探索，才有機會一鳴驚人。而創意的產生更有賴於敢於承擔風險的企業家精神，高強度的技術學習，以及政府對企業的鞭策、支持、保護。²⁸因此那些高級人才在知識經濟環境下，要在國家、企業的關注下，以很強的心理、知識素質，並且不計成果，努力不懈，以為國家民族爭取自主創新的新機運。

總之，在經濟學者的研究中，我們看到知識經濟下的人，他將面對的處境是：在中國知識條件落後的前提下，國家、社會、企業不斷的激勵、培育各級人才，整個社會變成學習型社會。在全國高度動員中，特別是高素質人才，更要潛心學習，苦心孤詣，以發展國家自主創新能力，使中國成為創新型國家，國家綜合國力提升，中國得以雄視於世界民族之林。人的處境將是面對高度張力，且被片面化為商品、人力資源。那些高素質人才將面對包括民族、國家、社會、學術機關、企業的聯合施壓，而且承擔創意不成或創意失敗的風險。至於其他一般人或貧困人口，也要在國家、社會的鞭策下學習，期待有朝一日由人口變為人才。在此，包括政府、社會、企業、學校、以及每個人自己的命運在內，全都被納入資本交換的多重宰制之中，若依 Marx 的觀點，這恐怕是最深刻的異化了，而且是出現在表面上遵奉他的社會主義國家之中。²⁹

二、法學方面有關知識產權與人權的研究

在知識產權問題上，相關的法學研究有幾類，首先多著眼於思考中國在知識產權建立上的不足之處，多由立法、執法的角度進行申論。³⁰亦有研究關注知識

²⁸路風，*走向自主創新：尋求中國力量的源泉*（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頁 46-55。

²⁹Karl Marx 著、伊海宇譯，*1844 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台北：時報文化，1990），頁 47-62。異化的處境，是因為私有財產制的生產關係，使人與他自己、人與他自己的勞動、人與他自己勞動的產品，人與他的類存有相分離，且還受到自己製造產物宰制。換言之，人未能在勞動中與他自己、勞動實踐、勞動的產品、類存有辯證統一。

³⁰此類論點，可參見以下研究：

梁永池、黑麗，「知識產權濫用案例評析」，*經濟論壇*，2004 年 2 月（2004），頁 119。

孟曉燕、王永勝，「知識經濟與知識產權」，*喀什師範學院學報*，第 26 卷增刊（2005 年 6 月），頁 47-52。

陳煒，吳軍，「知識經濟時代我國的知識產權保護與科技競爭力」，*貴州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7 卷第 5 期（2005 年 10 月），頁 60-61。

包國慶，「知識經濟時代的知識價值與高等教育」，*黑龍江高教研究*，129 期（2005），頁 1-4。

李祖明，「標準與知識產權」，*法學雜誌*，2004 年第 25 卷（2004），頁 25-27。

孫紅英，「論知識經濟環境下自主知識產權的有效營運」，*科技情報開發與經濟*，第 14 卷第 2 期（2004），頁 130-131。

產權觀念是來自國際規範，而指出中國在實施時，應注意如何因地制宜的問題。³¹第二，有的研究思考了大陸在知識產權課題上，面對國際經濟競合的壓力問題，多是探討中國應如何利用國際規範以面對跨國企業濫用知識產權的問題。³²第三，亦有研究思考知識產權與人權的衝突，多是由國際規範與法律角度，探討知識產權與其他人權的合理關係問題，主張伸張知識產權不應危害基本人權。³³這些著作討論知識產權目的，是為發掘知識產權在理論與實踐上的不足之處，以求釐清知識產權的觀念。其中第三類文獻，探討知識產權與人權問題，與本研究較為相關，因此進一步討論如下。

大陸有關知識產權與人權問題的討論，較具代表性的觀點如，楊明、蕭志遠，「知識產權與人權：後 TRIPS 時代的知識產權國際保護」、吳漢東，「知識產權的私權與人權屬性：以知識產權協議與世界人權公約為對象」、吳峰，「知識產權人權發展」等研究。³⁴這些研究的主要論點，可分為幾方面：第一、均由國際規範的角度進行探討，指出知識產權的概念自出現後，即與由世界人權宣言所建構的人權發生衝突，特別是 TRIPS 協議明訂知識產權為私權後，其與人權的關係就更待釐清了。第二、主張應在人權位階高於知識產權的基礎上，調和兩者衝突，此因普遍人權高於私權，也因必需有社會累積的知識背景，才會有個人的知識創新。兩者關係的釐清，一方面關係到知識創新發明人享有知識產權與社會大眾擁有分享知識成果的人權的權利衝突。一方面也因為知識產權多集中於發達國家，故也關係到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地位問題。在人權高於知識產權的基礎上，調和兩權的具體作法，則各研究分析的角度略有不同。例如楊明、蕭志遠指出知識產權的保護應顧及大眾的隱私權、健康權、環境權；吳漢東則指出保護發

袁愛玲、喬立新，「網路環境下知識產權保護特徵的變異」，商業研究，第 286 期(2004)，頁 150-151。

³¹例如，龍文懋，「制度及其相容性：知識產權法律制度的哲學文化考察」，社會科學戰線，2005 年 02 期(2005)，頁 208-211。

³²此類論點，可參見以下研究：

李先波、劉林森，「論涉外知識產權訴訟管轄權之協調」，湖南社會科學，2004 年 1 月(2004)，頁 79-83。

郭春榮、王建邦、郭艷平，「略論知識產權壁壘」，佳木斯大學社會科學學報，第 22 卷第 1 期(2004)，頁 25-27。

喬生，「中國限制外國企業對知識產權濫用的立法思考」，法律科學(西北政治學院學報)，2004 年第 1 期(2004)，頁 107-115。

³³此類論點，可參見以下研究：

劉華，「遵循與超越：對知識產權法與財產法原則的比較分析」，法律科學(西北政治學院學報)，2004 年第 1 期(2004)，頁 100-106。

黃玉燁，「知識產權與其他人權的衝突及其協調」，法商研究，109 期(2005)，頁 14-17。

³⁴請參考：

吳漢東，「知識產權的私權與人權屬性：以知識產權協議與世界人權公約為對象」，法學研究，2003 年 03 期(2003)，頁 66-78。

楊明、蕭志遠，「知識產權與人權：後 TRIPS 時代的知識產權國際保護」，法律科學(西北政法學院學報)，2005 年 05 期(2005)，頁 115-122。

吳峰，「知識產權 人權 發展」，上海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 年 03 期(2005)，頁 28-31。

明人的知識產權與保障社會大眾共享知識成果二者具相輔相成關係，不可偏廢；吳峰指出知識產權的提倡應是為求人類發展，應在強調發展權的前提下思考保護發明人權利的問題。第三，由於知識產權與人權的衝突，以及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在知識產權課題上的爭持，是故這些研究均注意到知識產權在國際規範、國內法律的層次上尚在建構之中。在這些爭執中，具代表性的事件如 2001 年多哈的 WTO 部長級會議通過 TRIPS 協議與公共健康宣言，即在以南非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的爭取下，要求在落實 TRIPS 協議時，應更加尊重人的生命權、健康權。但如何實踐，則尚待研議。

這些研究立足於對國際規範進行引經據典的內容分析，關心了在提倡知識產權潮流下人的權利的保障與伸張。其貢獻在於釐清了在國際規範層次上知識產權在人權問題上的發展與磨合，並由國際條約的文本中去探討知識產權與人權關係，也注意到在知識產權觀念下，不同權利主體間具有的不平等狀況與折衝，而此一折衝又反映到國際規範的不斷修正上。因此這類研究假設知識產權與人權有一本真的、經典的定義可以依循或追求，這意味著它們是以去社會的角度來思考知識產權與人的關係，或者說它們是由國際規範的論述立場來建構知識產權與人的應然關係。

在法學的研究中，我們看到國際規範對中國的壓力，看到中國為了抵禦國際壓力而建構知識產權，知識產權又與人權產生衝突。在此顯現一系列正式制度對人的建構與制約，而正式制度間的衝突，又對人產生影響，人成為正式制度競逐下的對象與他者，而對人種種建構又是為國家的權力意志服務。知識產權下人的處境仍是異化的。但是由知識產權在國際規範、國內法律中的諸多衝突，也突顯了知識經濟中，存在著許多不同的立場。它們雖在目標上均符合一般社會主流立場要求促進知識經濟，促進正式制度的主張，但內部仍有許多斷裂與衝突，顯見主流立場並非鐵板一塊。

三、文化方面有關知識經濟與人類前途的研究

在建構知識產權，推動知識經濟情況下，人的生命將出現何種轉變。余瀟楓、崔浩在其知識經濟與思想文化的變遷一書中認為知識經濟時代，知識跨時空的流動性，將使人自對物質的依賴解放出來，過去壟斷物質資源的管理機構權威將會下降，人也取得跨時空的交往與生活方式，因此人可取得自我與人類全體、自然世界的和諧關係，人將自覺的在不失自我的前提下向世界與自然開放，世界公民將成為人的新目標。因此，知識經濟時代表人進入類體時代，人將回歸其類存在的本質，回歸人類一體，不再因人為畛域而彼此敵視。簡言之，余瀟楓、崔浩樂觀的認為，知識經濟將使人擺脫人為區隔，自由而多元的交往互動，真正成為類

存有。在此情境下，人將在網路一體化的世界中，成為網路中的節點，符號建構意義。人將由依賴物理世界轉而依賴符號世界，符號的價值提升與意義尋求將是決定人類發展越來越重要的生存條件。³⁵

相對於上述樂觀的看法，黃力之在其「歷史和現實語境中的『以人為本』：論和諧社會的發展理念」一文中則採取批判的態度。他認為現代社會很容易因社會主流論述的引導，而使人的發展限縮在經濟範圍內，造成人的異化。他批評了大陸社會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和「發展是硬道理」只理解為發展經濟，又把發展經濟理解為不顧一切地追求 GDP 的增長。這在政治權力壟斷和生產資料私有的配合下，一方面必然在直接的物質利益上損害了底層群眾的權利；另一方面還在人的全面發展方面造成了異化現象，造成只從生產力的角度去評價人的價值。在此指出了社會若將發展窄化為經濟發展，將使人淪為為經濟發展的工具，造成人的異化。社會在經濟掛帥主導下，也會造成全社會依每個人對經濟的貢獻度，而區分為不平等的上下等級。他特別指出，多年以來，中國對自己廉價勞動力的誇耀和自豪就凸顯了這樣的價值觀。因此黃力之對大陸過去的發展對人的影響，採取了批判的態度，他認為真正理想的社會應是如 Marx 指出的人要不斷地改善自己的生活條件並創造出更多的「自由時間」來顯示和發展自己的「天性」，發展不追求任何直接實踐目的的人的能力和社會的各方面潛力。³⁶必須使人展現無限的可能性，才是對人的真正復歸。陳勝雲在他的「意義和諧：和諧社會的意向性」一文中也呼應了上述主張，他認為要解除人的異化，實現人的全面發展，首先在經濟方面不能光由人的生產力解放著手，也要滿足人在消費上的須求，如此才能達到社會在經濟上、物質成果享有上的真正平等。其次在政治方面，他主張不同利益群體應平等參與政治。最後在文化方面，他認為在知識經濟的全球化時代，文化總處於多元狀態，因此要積極發揮知識分子的作用，因為守護著主流意識型態的知識份子既是社會產生凝聚力的中堅，也是引導社會其他成員認同主流意識型態的主要立場。³⁷上述兩位大陸學者，均認為若不能真正重視人的各方面發展，而循著經濟掛帥的論述慣性，則大陸在知識經濟與市場經濟發展下，將造成異化與社會不平等。知識分子是扭轉社會因經濟發展的庸俗化取向的主要力量，知識分子要在經濟大潮中，守護、指引人們在文化上的出路，但是知識分子為何能跳出社會主流論述的制約，則未見探討。

因此文化方面的看法較紛歧，有學者認為符號流通的特性，將增加彼此溝通與瞭解，人也將發揮符號的力量，尋找人多種可能的意義。但也有學者認為，參

³⁵余瀟楓、崔浩等著，知識經濟與思想文化的變遷（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1999），頁 8-15。

³⁶黃力之，「歷史和現實語境中的『以人為本』：論和諧社會的發展理念」，上海市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編，科學發展 和諧社會：科學發展觀與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研討會論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頁 91-99。

³⁷陳勝雲，「意義和諧：和諧社會的意向性」，上海市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編，科學發展 和諧社會：科學發展觀與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研討會論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頁 100-105。

與符號交流的軟硬體條件是不平等的，故人與人將隨著符號流通的加速，更加不平等，又因人對符號的依賴，人與符號之間也將不平等，而受符號的宰制，淪於異化的處境。會有這些紛歧的看法，其實是因為知識經濟乃是新生事物，又加上其有助符號快速流通的特性，使得知識經濟以及伴隨著它而生的許多新興現象，例如網路媒體等，均呈現快速變貌，難以界定與認知的問題。造成它們對人的影響有更多的可能性，人如何與知識經濟時代的許多新興事務共存，並進而藉著它們以發揚自己的個性，實為當前人類前途的一大課題。³⁸

總上所述，對於大陸知識經濟與人的處境研究有幾個特點與問題，由此也可見大陸社會研究此一主題的語言氛圍：首先是民族國家的意識，特別是經濟學與法學的研究均注意到知識經濟的全球化特性，但均力主大陸不論在法律建構、知識創新、企業競爭上，均要重視自主性，減低對國際的貿易依賴性，以維持國家安全。第二，經濟學與法學的研究均認為政府應居主導地位，面對知識經濟在全球法制、商業的競爭中，均主張政府完善立法、政策鼓勵是中國發展知識經濟的主要方法。第三，法學研究中亦注意到知識產權法律的建構性，知識產權是與國際規範、國際競爭、公民權利互相拉扯的一套制度，因此知識產權法律必須具備適應性，以不斷建構其意義。由此也反應知識經濟在觀念與實踐上，有許多不同立場彼此競逐。第四，回到人的處境問題上，經濟學、法學、文化方面研究共同提出了幾個問題：知識經濟下人類前途究竟是公平開放還是宰制封閉、究竟是人的異化還是人的解放、究竟是人的符號化還是符號的人化，特別是假若上述的民族主義、政府主導、法律建構的因素確實存在時，面對這許多權力意志的作用，知識經濟下的人類命運真的能夠樂觀期待嗎？均是由上述文獻引出的重要問題，有待進一步思考。³⁹

第三節、研究途徑與方法

在研究途徑上，本研究將採取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來進行探討。至於具體的研究方法，本研究將採取論述理論（discourse theory），藉由分析文本的論述立場，以及探討諸多立場的關係，以回應研究主題。

一、文化研究

文化之所以成為須要研究的課題，主要是因為資本主義社會產生了異質性的

³⁸尹建中、李英明、張一番、謝清俊、謝瀛春、瞿海源、羅曉南，資訊科技對人文、社會的衝擊和影響（台北市：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研究所，1997），頁144。

³⁹Stefan Sullivan, *Marx for a Post-Communist Era: On Poverty, Corruption and Banality*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2001), pp. 1-20.

文化，使人意識到文化充滿差異性，因此文化是須要研究的對象。又因為文化的異質性，故文化研究結合了社會學、文學理論、影像研究與文化人類學來進行思考。

今日所謂文化研究，是開始於1956年英國學者 Raymond Williams 和 Richard Hoggard 對於當時英國中下階層的大眾通俗文化的研究，並注意到通俗文化是不同於上流階級的菁英文化或貴族文學。Williams 和 Hoggard 並於1964年成立「伯明罕當代文化研究中心」，產生了所謂「伯明罕學派」(Birmingham School)。文化研究開始受到關注。至1970年代，英國與美國學者之間發展出不同的研究路線。英國的研究路線受到法蘭克福學派批判文化工業的影響，因此較傾向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並且批評資本主義大眾文化，認為掌握生產工具的人，同時也控制意義的生產，因此對人進行更深刻的宰制。美國的研究路線則站在較為肯定大眾文化的立場，思考大眾文化對人的解放的意義，認為人會能動的面對那些被主流價值生產的文化產品，會在其間進行意義的挪用、連結，而得到快感。這兩派代表了文化研究中對「結構」與「能動性」之間消長關係的重視，前者較強調文化生產對人的宰制，後者較強調人在消費中得到快感，兩者的關係一直是文化研究爭論的主題。也有一些研究者，例如 John Storey 試圖連結這兩個立場。但是不管側重「結構」還是「能動性」，文化研究均以解構習以為常的文化，揭露它們背後的意義生產機制為目的，因此文化研究具有批判性，致力於對現代社會進行道德評價，以及進行激進的政治行動。⁴⁰

在文化研究的觀點中，所謂文化被視為是「表意實踐」(signifying practices)，文化的功能就是生產意義、生產符號。文化研究的問題意識可說是企圖理解「符號的生產與流通，及其中蘊含的權力生產與流通」，或者是由「處在協力關係網中的研究者，研究處在協力關係網中的文本與實踐」。⁴¹

關於文化研究途徑，因其採取反學科的策略，故難以單一方法論呈現，但其基本立場是以反本質主義 (anti-essentialism) 反還原主義立場

(anti-reductionism)，以遇合 (conjuncture) 的研究方法，探討在多元權力場域中的大眾生活實踐問題，以求改善大眾的生活。所謂反本質主義是指符號的意義是來自社會結構與人的互動，以及在此互動下的相互建構，因此意義是不斷變動的，不存在本真的、超驗的意義。反還原主義是指符號的意義來自多元互動、多元制約、多元生產，對社會現象的解釋不能化約、還原為單一因素決定論。遇合

⁴⁰John Storey, *An Introductory Guide to Cultural Theory and Popular Cultural*, (London: Harvester Wheatsheaf, 1993), pp. 199-202.

⁴¹羅鋼、劉象愚主編，*文化研究讀本*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頁 66-76。

王逢振，*文化研究* (台北：揚智，2000)，頁 17-23。

Chris Barker, *Cultural Studies Theory and Practice*, second edition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Ltd, 2003), pp. 32-54.

指在研究方法上的跨學科、反學科取向，即採取適應研究者與研究對象當下須要的內在主義取向來選擇的研究方法，不會以預設方法論侷限研究的視野。反學科立場的更深刻意義是，文化研究在批判拆解與重新建構當前文化現象的同時，其實是在進行具體的社會參與和實踐，也是在破除知識被神聖化的迷思。經由揭露、解構，使那些自命真理、客觀知識的符號或論述還俗化，使那些符號、論述不會淪為一種權力美學或政治美學操弄工具或結果。在這裡可知為什麼文化研究不能夠被一些號稱在進行科學客觀的主流研究所理解、接納的原因，因為任何一個學科或領域，要建立一個主流的知識，那一定要強調這套知識是可以建構一套本真的、客觀的事實，而這客觀的知識可以呈現歷史的原貌。這其實也只是希望將偶然建構的符號，宣告為必然客觀的真理。一套科學知識的建立其實是一個權力建構的過程，文化研究就是要揭露這一點。在這個意義上，文化研究本身當然具有高度的與知識權力對抗的意義，這是為什麼文化研究在不同的領域中一直不能成為主流，因為它就是在挑戰權力，解構既有的知識權力。而文化研究在批判時，也要避免自己成為新的文化霸權，此即文化研究站在反學科立場的原因所在。⁴²順著上述的觀點，既然文化研究認為社會是多元因素競逐符號意義的場域，則它的研究主題主要即在以多元觀點、動態觀點探討此一多元權力的互動，透過解構看似必然的宏大敘事，以取得人的能動性，因此文化研究在此意義上具有對現實社會的批判性，改善生活的實踐性。⁴³

文化研究具體的研究課題主要在於由大眾的文化實踐以見大眾受權力限制與生產的情形。實踐是人以符號活動去宰制、占有自然、社會、自己的過程，使自然、社會、自己都由人賦予意義而人化，人亦成為自然人、社會人、建立自我認同，人亦從而得以生存。人的生命實踐即為文化，文化即語言或文本，文本即符號，而符號即權力，因符號的操作即為一個彰顯與遮蔽的過程，即是一個樹立等級秩序的過程，文化研究即權力研究。因此，文化研究是研究符號的生產與流通，亦即權力的生產與流通。其中權力問題是展現在施與受之間，故欲具體探討權力，必須探討作為權力施加對象的大眾，但基於反對二元對立，此一大眾非相對於精英的大眾，而是指所有人的文化實踐。⁴⁴

二、論述理論

在研究方法上，本文將採取論述理論，以落實上述文化研究途徑的問題意識。所謂論述理論，基於文化研究的反學科立場，並無公認的理論公設，本研究

⁴²李英明，「方法論—文化研究途徑」，中國大陸研究中心，2005年8月29日，http://ics.nccu.edu.tw/document/newsletter/05_05.pdf。

⁴³羅鋼、劉象愚主編，文化研究讀本，頁66-76。

王逢振，文化研究，頁17-23。

Chris Barker, *Cultural Studies Theory and Practice*, second edition, pp. 32-54.。

⁴⁴Peter C Pugsley, "Cultural Studies in China," *The China Journal* (Jul 2006), pp. 202-203.

對於論述的思路，主要是來自 Michel Foucault 相關著作的啟發。具體而言，本文將由媒體報導的文本中抽繹、考察幾種主要論述，以見大陸社會的各種權力意志如何形塑、結盟、建構其知識產權的觀念，進而考掘人在接受知識產權觀念，及其背後由諸多權力意志交織而成的協力關係網後，生命情狀會受到何種規訓。⁴⁵

所謂論述是某種權力意志的表徵，它是社會化、歷史化、制度化形構的產物，它建構符號的意義，語言系統產生的直述義、引申義均來自論述，論述是先於個人而存在，制約著人的文本讀寫與實踐活動，但論述也在人的文本讀寫與實踐活動中得到再造。⁴⁶權力意志在本研究中是指創造性的本能，人的一切欲望是權力意志派生出來，有機生命的一切功能也來自同一泉源，亦即一切的欲求、創造、再現均是同一權力意志本身的不同變體，是一種依循能量守恒原則的運動。⁴⁷

在論述理論觀點下，社會是多種論述交鋒、對話的場域與過程，社會是一種多種權力意志拉扯下的協力關係網。⁴⁸在一個社會中，存在著多元論述 (multi-discourse)，亦即不同的權力意志，它們作為不同的文本與實踐的基礎，

⁴⁵Michel Foucault 著、劉北成、楊遠嬰譯，*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台北：桂冠圖書，1992），頁 25-26。

Gavin Kendall and Gary Wickham, *Using Foucault's Methods*, (London: Sage, 1999) pp. 24-34.

⁴⁶Michel Foucault 著、王德威譯，*知識的考掘*（台北：麥田，2001），頁 153-162。

⁴⁷Friedrich Nietzsche 著、張念東、凌素心譯，*權力意志：重估一切價值的嘗試*（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頁 33-34。

權力意志源自 Nietzsche，其德文原文是 *der wille zur macht*，英譯為 *the will to power*，在中文世界中因為此一譯名易於引發政治聯想，致存在著翻譯上的爭議。例如張念東、凌素心主張應譯為權力意志。張念東、凌素心在 *權力意志：重估一切價值的嘗試* 一書的譯序與譯者說明提到，Friedrich Nietzsche 的思想具有兩面性，一是頑強的抗爭精神，蔑視一切權威的批判精神。二是崇尚權力、強權、壓制，超人政治，而且有明顯的專制主義與日爾曼種族主義色彩。認為 Nietzsche 批判現在，目的是朝向未來，而未來世界的建立是包括世俗的政治部門，並且未來世界是保證了超人與日爾曼民族的優越性。因為此一創造性的意志是帶有政治意涵的，因此權力意志是適當的譯名。陳鼓應則反對譯為權力意志，認為衝創意志才是適當的翻譯，因為 Nietzsche 是反對政治權謀，並批判當時的德國政治，Nietzsche 關注的是每個個體都有向著更高、更遠、更複雜目標發展的意志力，因此 *der wille zur macht* 是批判政治、超越政治的創造生命的意志。

本研究主張 *der wille zur macht* 在排除尼采專制主義與種族主義侷限性的前提下，應譯為權力意志。因為如 Karl Marx 在「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中說：「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哲學思考的目的是批判現況，同時也就或隱或顯的指向更理想的未來。因此第一、權力意志觀念是 Nietzsche 批判現狀的思想武器，其中包括對政治的批判。第二、權力意志也是建構未來世界的依據，而建構活動本身就是一種力與強制，並且帶有無限的可能性，也可能包括對未來政治的建構。第三、政治可以廣意的理解為權力運動，權力的意義是指強制力。基於以上，本研究認為權力意志不但不能去政治的來理解，甚至權力意志即為政治性的活動與操作，因此權力意志此一名稱在中文語境中引發的政治聯想是不須避免的。以上所述，參考：Friedrich Nietzsche 著、張念東、凌素心譯，*權力意志：重估一切價值的嘗試*，頁 1-6。

陳鼓應，*尼采新論*（台北：商務，2005），頁 110-114。

Karl Marx，「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上*（廣東：人民出版社，1972），頁 16-19。

⁴⁸Tony Tant, Andrew Gamble and David Marsh, *Marxism and social science*, (Basingstoke, Hampshire England: Macmillan, 1999), pp. 61-84.

與對同一文本與實踐進行不同解讀的前提。⁴⁹但此一觀點絕非主張某種取消人的主體能動性的決定論。誠然論述理論強調人透過論述以掌握外在世界，但論述基於符號具有不固定的本質，以及論述間有各種合謀、連接的可能性，致論述的邊界、論述間的組合方式具不固定性，因此事物的意義是隨著時空轉移、替換，因此任何的論述均有相對的侷限性，人對於客觀事物永遠能基於不同論述作多元的解釋。換言之，人與論述、論述與論述之間，在每個具體事物上形成互為鑲嵌的辯證關係。而制約人的論述具有不固定性、無限可能性，在此同時，人也取得不固定性、無限可能性。論述雖然因多元論述的競合而具不固定性，但是例如像知識產權這類符號，可說在各論述交鋒後，使各論述暫時表態，以致意義暫時固定的波節點（nodal points），這使得對論述的觀察與研究得以進行。⁵⁰

文化研究與論述理論分析的重點是符號，符號一般是以文本為載體，因此文化研究也可視為在研究文本，所謂文本是後結構主義順著反本質主義立場，提出了主體離心化的主張，並在此主張下重新審視各種符號產品後的概念。基於主體離心化的看法，作者不再是寫作的主體，作品也不再指向實在，引導寫作的符號流動，以及寫作所完成的文本本身，才是分析的重點，文本是一個複合的空間，是各種引文拼貼的場所。Roland Barthes 對文本的含義作了描述，⁵¹

- 1.在方法的向度上，文本不應被當成可測量的客體，文本不像作品那樣是可以計量的。因為作品是實體的一個片斷，佔據著書本的空間，作品的質量是固定的、靜態的。本文則是存在於符號的生產過程中，它的質量是流動的、動態的。文本往往跨越多個作品。
- 2.在類型的向度上，文本的範圍較廣，不限於文學，文本不受制於類型區分，特別是不受限於類型區分後的等級秩序。
- 3.在符號的向度上，文本是一個意義的開放系統。作品最終指向固定的所指，而文本則是指向能指，而能指通向各種可能的所指，文本的所指是無限延異的。
- 4.在多元性的向度上，文本是意義的爆炸，它的意義是無限的、不確定的、動態的，而不僅僅是具有幾種可供選擇的歧義。

⁴⁹以上對論述、多元論述的釋義，請參考：John Fiske 等著，李彬譯注，*關鍵概念：傳播與文化研究辭典*第二版（北京：新華出版社，2003），頁 84-86、174-175。

⁵⁰有關論述理論的本體論與認識論問題，請參考 Ernesto Laclau and Chantal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second edition (London: Verso 2001), pp. 105-114.

「波節點」：在論述理論中，指某一論述透過宰制其他論述，使意義暫時固定的時刻。請參考 Ernesto Laclau and Chantal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second edition, pp. 112-113.

⁵¹楊大春著，*後結構主義*（台北，揚智，1996），頁 145-170。

- 5.在起源的向度上，文本沒有起源，文本本身即為起源，作者是附屬於作品的。作品則被視為是作者的產物，並由國家、社會透過如著作權的立法與觀念保障作者對作品的合法性。
- 6.在閱讀的向度上，閱讀文本不是讀者被動的接受文本，而是與作者一起參與文本意義的生產遊戲，讀與寫的界線消失了，文本是開放的讓作者與讀者一起進行遊戲、活動、生產、實踐。作品通常則只被視為消費的對象，讀者只能被動的消費作品的固定意義。換言之，文本具有可寫性，作品只有可讀性。
- 7.在愉悅的向度上，讀者在不受作者、不受其他文本宰制下，參與文本的意義生產遊戲，得到極樂。而作品只能提供消費性的愉悅。其中極樂和愉悅的差別是讀者因著閱讀上符號意義自由度的提高、參與度的增加而產生的不同程度的感受。但相對的也是意義不確定性的提高，不確定常會帶來沮喪感，極樂和沮喪是一體的兩面。

簡言之，文本是能指的組合，具有無限的解讀空間。是故，Fredric Jameson 指出：文化研究的研究客體包括文本、作者、讀者間的「協力關係網」而非單一文本、作者或讀者。⁵²換言之，文化研究是處在協力關係網中的研究者，研究處在協力關係網中的文化。以文化研究、論述理論為切入點，有助於分析形塑中國大陸知識產權的各種主要論述，以見各種論述形成的張力與共謀關係，有利於豁顯文本的研究主題。換言之，本文的目的主要在探討研究對象「如何」被談論？以及它「為何」被如此談論？亦可說是探討知識產權此一符號的建構的方法、條件、過程、機制與效果問題，並進而省思其中人的處境問題。

三、解讀文本的策略

但是，如何接近本文，是一個有待思考的問題。基於文化研究的遇合觀點，因此本研究在此問題上，主要參考 Edmund Husserl 的現象學觀點。Husserl 觀點的基本表述就是「走向世界本身」，經由多角度的體驗、反思以回歸現象本身。特別是要將那些被自然化的、習以為常的成見、方法、設定「懸置」起來，對那些成見存而不論，讓那些成見終止判斷，讓眼前的事物成為全新的研究領域。換言之，即是要化熟為生，不以先入為主的觀念套裁經驗材料，以無知、陌生、敏感、好奇的態度洞察、體驗本文，特別注意挖掘習以為常的事物、不證自明的道理。在此基礎上對事物進行直觀，亦即透過各種自由想像，各種可能的角度來看文本的本身，使文本是由我的實踐來進行陳述，確立意義，而非假手他人來賦予

⁵²王逢振，文化研究，頁 17-23。

意義。⁵³

此一現象學的觀點，結合文化研究的反本質主義立場與論述理論後，具體操作的方式即是以解構的角度來分析文本，發掘那些宏大敘述之中習以為常的意義連結中的斷裂之處。在解構的閱讀下，調動作者自己的知識儲備與生活實踐等主觀能力，與文本的符號使用取得妥協，此即 Hans-Georg Gadamer 指出的「視域融合」。即文本是由特定的前見、視域（意義活動空間、問題域、世界觀）開始講話，讀者亦由特定的前見、視域進行理解，詮釋活動就是讀者和文本取得共同視域。⁵⁴簡言之，閱讀與詮釋活動是主客交融，文本參與到讀者的生命實踐之中，文本的意義在此過程被讀者重構，閱讀成為一個創作的過程。

本研究採取上述文化研究途徑，論述理論研究方法，經由現象學的直觀重構文本，而以身體政治學（body politics）作為本研究的旨趣。⁵⁵即將身體政治學視為多元論述、多種權力意志交織出來的，並施加在人身上的機制與策略。所以在上述研究途徑與方法的指引下，可以有效回應本研究的研究旨趣。

除了以上所述，下列學者提出的概念，均為有力的分析工具。舉其大者如下。⁵⁶

首先，在語言學與符號學的向度上，下列研究成果，提供了有助探討符號意義問題的概念。包括 Ferdinand de Saussure 在其符號學中，分析了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的關係，指出符號的意義不具有本真性，而是由特定的語境偶然而生。⁵⁷Barthes 提出的神話學（mythologies），探討了符號背後的神話（myth）讓符號由直述義提升到引申義，並進而自然化為不證自明之理，思考了符號取得象徵意義、或相對特定語境的本真意義的問題。⁵⁸Jacques Derrida 的延異（différance）概念，指出符號的意義是無限的暗示，是能指向能指的不斷轉移，而不是指向所指。說明了意義在時間上的延宕，在語言結構空間中的差異，強調符號不能完整的表示意義，符號的意義永無完熟之日，總是有所彰顯有所偏

⁵³Edmund Husserl 著，李幼蒸譯，純粹現象學通論（台北：桂冠，1994），頁 109-115。

⁵⁴洪漢鼎，詮釋學史（台北：桂冠，2002），頁 223-228。

⁵⁵Chris Barker, *Cultural Studies Theory and Practice*, second edition, p48 社會科學在「語言、文化轉向」後，近年有「身體轉向」（somatic turn）

有關身體的社會科學研究亦可參考：陳明珠，身體傳播：一個女性身體論述的研究實踐（台北：五南，2006），頁 93-159。

⁵⁶以下所述西方學者的論點，可參考：John Storey, *An Introductory Guide to Cultural Theory and Popular Cultural*.

以及 Chris Barker, *Cultural Studies Theory and Practice*, second edition.

⁵⁷Ferdinand de Saussure 著，高名凱譯，普通語言學教程（北京：商務，1999），頁 100-106。

⁵⁸Roland Barthes 部份請見 Roland Barthes 著，許薔薔、許綺玲譯，「現代神話」，李福海、姜孝慈編，神話學（台北：桂冠，1997）。

蔽。⁵⁹Louis Althusser 提出的徵候閱讀法 (symptomatic reading) 則有助吾人考掘文本下的問題意識, 把握文本中隱藏的東西, 進行生產性的閱讀。⁶⁰這些研究有助分析符號如何取得直述義與引申義, 並關注能指與所指間的偶然關係, 以及意義的自然化、浮動性、延展性問題, 並且也有助思考隱藏在文本背後的立場與主張。

第二, 在後結構主義的向度上, 下列的知識成果, 有助探討建構符號的論述問題, 思考了能指與所指間建立關係背後的建構力量, 或意義延異的可能方式。其中包括, Foucault 在其著作中, 揭示了圍繞主流立場的知識與機制, 以及主流立場背後的權力意志、論述立場, 並指出主流立場不具本真性, 它是多元論述結盟、建構的暫時結果, 有效處理了主流立場轉變的可能性。⁶¹Ernesto Laclau 和 Chantal Mouffe 的論述理論指出了不同符號或論述經由連結 (articulation) 擴大其包容性與象徵意義, 使論述的邊界模糊化, 顯現了論述的無定性、無邊界, 則更突顯了多元論述進行結盟後, 意義永遠在互文性中被不斷改寫、重構, 詮釋, 創造了符號與論述的無限可能性。⁶²

第三, 下列研究則思考了, 這些論述如何施作在人身上, 從而對人進行制約並創造可能性的問題。包括 Antonio Gramsci 則在其對文化霸權 (hegemony) 的討論中, 提出了文化霸權是由社會領導階級與被領導階級在各自論述立場上, 經由論述的鬥爭, 上下協商 (negotiation) 而成, 並非純粹由領導階級制定, 突顯人在多元論述情境下, 可以進行各種操作。⁶³Althusser 在其意識形態國家機器

⁵⁹Jacques Derrida 著, 張寧譯, 書寫與差異 (台北: 麥田, 2004), 頁 79。

⁶⁰Louis Althusser、Etienne Balibar 著, 李其慶、馮光文譯, 讀資本論 (北京: 中央編譯出版社, 2001), 頁 8。Louis Althusser 認為「所謂徵候讀法就是在同一運動中, 把所讀的文章本身中被掩蓋的東西揭示出來並且使之與另一篇文章發生聯繫。」這種閱讀不再是看視覺可以看到的、顯性的文本, 而是讀不可見的、隱匿的、背後的文本。這就需要建構一種不同於文本的新的問題意識, 在新的問題意識參照下, 才能通過文本的空缺, 把握文本中隱藏的東西, 這將是一種生產性的閱讀。

⁶¹Michel Foucault 著, 劉北成、楊遠嬰譯, 規訓與懲罰: 監獄的誕生, 頁 25-26。

⁶²Ernesto Laclau and Chantal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second edition, pp. 105-114.

此外, 所謂「互文性」(intertextuality) 在後結構主義中, 指符號的意義非單一文本決定, 而是在讀者閱讀多重文本交互作用後逐漸產生, 因此意義永遠無法確定。可參見 Chris Barker, *Cultural Studies Theory and Practice*, second edition, p. 95。後結構主義站在反本質主義 (anti-essentialism) 立場, 認為符號或文本的意義永遠在互文性中被不斷改寫、重構, 詮釋的結果不過是意義暫時的停頓, 因此問題意識不再是追問真相。另外, Michel Foucault 著重探討權力的運作及其效果問題。凡此, 均啟發了本研究問題意識的形成。請參考: John Storey, *An Introductory Guide to Cultural Theory and Popular Cultural*, pp. 154-180。

有關反本質主義請參考 Robert Boccock 著、田心喻譯, 文化霸權 (台北: 遠流出版社, 1991), 頁 137-158。

「連結」指多種論述、社會力量的接合, 可能代表了力量的合併, 也可能代表了支配性關係的建構。請參考: John Fiske 等著, 李彬譯注, 關鍵概念: 傳播與文化研究辭典第二版, 頁 16。

⁶³Antonio Gramsci, Quintin Hoare & Geoffrey Nowell Smith ed. & trans.,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of Antonio Gramsci*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1), p. 254. Antonio Gramsci 認

的觀點中，提出論述對人的召喚（interpellation）收編（incorporation）作用，強調人經由從屬於特定論述而取得自我認同，指出論述對人的制約作用，指出人的主體性是特定論述脈絡下的產物。⁶⁴李英明在其新制度主義與社會資本一書，強調了分析社會現象，應重視鑲嵌（embedded）的概念，亦即強調人類的自主能動性和以制度、組織、歷史所形成的論述存在相互作用的關係，縫彌了人與論述的張力。⁶⁵

第四，在認知心理學方面，論述則表現為人們的認知框架。所謂框架（frame），依據 Erving Goffman 的看法是指一組特定的期望，我們用這些期望來理解特定時空的社會情境。雖然社會變動不居，但人們總是經由框架來認知環境，使一切符合常規，⁶⁶因此框架是人們或組織（包括新聞媒體）對事件的主觀解釋與思考結構。唯有透過這個主觀的結構，人們才有能力界定問題，瞭解事件發生的原因，從而提出決策與解決方案。一般來說，框架有以下功能：協助讀者按照既有且熟悉的模式，組織社會真實，啟動思考，以及過濾閱讀資料。簡言之，就是說讀者在閱讀新聞時，會使用自己的框架解讀文章中的資訊，以便完成歸因過程以及瞭解事件。⁶⁷換言之，框架是一種符號場（semiotic field），在這個場內，規畫了符號、論述間的連結地圖。⁶⁸因此框架的作用大致有二：一類指界限之意，可引申為對社會事件的規範，另一類則指人們用以詮釋社會現象的「架構」。由界限的定義來看，框架像是人們藉以觀察世界的鏡頭，凡屬此鏡頭納入的實景，都成為人們認知世界中的部分。框架的正面意義固然在於協助人們思考或整理訊息，建構意義。但另一方面，框架也成為人們意識形態或刻板印象的主要來源「框限」了主觀認知世界的活動，具有限縮意義的效果。⁶⁹

上述學者的諸多概念，誠然其立論的哲學背景有所差異，若應用在對論述的思考上，則共同指出了意義是由語境所建構，且建構力量經常是多元的、多變的，勾勒了意義的變動性與多元論述間的複雜的借力使力關係，論述之間互相依賴，又各具不可替代的相對獨立性。也指出了論述與不同階級的複雜關係，以及

為，國家權力一般都具有雙重職能，即強制力與意識形態領導權的結合，而前者又是以後者為基礎。他所說的意識形態領導權是指思想、道德方面的統治權，亦即所謂文化霸權，它的功能是为國家提供政治思想和倫理內容，並以被統治階級的認可、同意為條件。

⁶⁴Louis Althusser 著，逢登迎譯，「意識形態和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研究筆記）」，頁 320-375。

⁶⁵李英明，新制度主義與社會資本（台北：揚智，2005）。

⁶⁶Stanley J. Baran、Dennis K. Davis 著，楊志宏、周金福譯，大眾傳播理論基礎、發展與未來（台北：華泰，2001），頁 326-333。

⁶⁷劉澤江，「新聞框架理論探析」，大學時代（B版），2006年3期（2006），頁 24-25。

劉豐、田春燕，「用框架理論分析媒體導向：以『9·11』事件後美國主要媒體報道的分析為例」，西南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年06期（2005），頁 33-36。

⁶⁸韓曉玲、陳中華，「框架理論及其在話語分析中的應用」，外語與外語教學，2003年9期（2003），頁 1-3。

⁶⁹劉澤江，「新聞框架理論探析」，大學時代（B版），2006年3期（2006），頁 24-25。

論述與人的認知間的關係。均對本研究的各項思考產生了有力的啟發。⁷⁰

第四節、研究的意義與限制

一、本研究的意義與價值

本研究首先關注了知識產權此一大陸社會的新生事物。其次，思考知識產權對人的影響與意義。第三，關切了威權國家（authoritarianism）如何運用知識產權加強其對人的介入。⁷¹本研究對於理解大陸社會與人的處境問題具有研究的重要性。尤其是本研究主題在文化研究的取徑下，將產生如下的特性：

- 1.由文本分析出發：研究的起點將是分析與知識產權有關的網路媒體文本，探討建構知識產權的論述立場為何？若建構知識產權的論述立場、認知框架不只一個，則它們分別是那些立場？因此本研究是採取解構的觀點，視文本為多種權力意志的複合，視主流立場為多種權力意志的偶然共謀。
- 2.論述的合謀關係：建構知識產權的多種論述立場之間的關係為何？它們如何共謀建構知識產權？因此本研究在研究結果呈現上，將是展現多種的權力意志，及其結盟關係，而非呈現單一的自變項與依變項關係，或追求單一的、本真的定義。
- 3.多種論述立場對身體施加的張力：人若為知識產權所召喚，而生活在上述的多種論述立場之間，將使人面對什麼樣的張力？此一張力即是促成人們在知識經濟時代進行實踐的權力意志網路。因此本研究關切的是人在知識產權的規訓下，被進行了什麼樣的意義建構、什麼樣的意義生產與限制，而不單純的認為規訓力量對人僅是阻力或助力。
- 4.對主流立場的批判：若身體在知識產權規訓下，會產生預期之外的實踐，由此也就挑戰了主流立場的權力意志，而展現身體的能動性與對主流立場的批判性。因此本研究不是對知識產權的推行現況作出順從式的解釋，而是關注知識產權會引發何種主流立場預期之外的實踐，也就由此證成主流立場僅是特定時空中的偶然。

⁷⁰劉紀蕙，「文化研究的視覺系統」，中外文學，第30卷，第12期（2002年5月），頁12-23。

⁷¹呂亞力，政治學（台北：三民書局，1991），頁167-168。威權指人治為主，國家對社會有限度控制，社會多呈割裂狀態。

簡言之，本研究特點在於對知識產權的相關文本作出解構與批判，以展現主流立場的偶然性與建構性，以及身體面對的壓抑與動能，而非以尋求單一的因果演繹為目的。而本研究與文獻回顧中的研究成果的不同之處主要在於，本研究以批判與解構為主，與前述經濟學的客觀主義角度不同；本研究以反思意義的多種可能建構為主，與前述法學的本質主義角度不同；本研究也將思考知識經濟中人的能動性與解放問題，以回應前述文化方面研究所關心的人類前途問題。

二、研究限制

首先，本研究以知識經濟時代的身體政治學：大陸網路媒體對知識產權建構的論述分析為題，大陸網路媒體對知識產權的建構是本研究分析的起點，因此研究中會涉及網路媒體的特性，但本研究並非以研究網路媒體為主要目的，是故有關網路媒體部份，僅討論和本研究相關的問題。並且網路傳播的宣傳效果，因資訊快速傳播，超文本的連結，與閱聽人的開放性致不易掌握。而大陸官方的網路審查在各別事件中究竟起多大作用，亦不易核實。因此有關網路媒體問題，本研究將就選擇案例的具體呈現狀況來加以探討。

第二，本研究著眼在知識經濟時代人的處境問題，而以屬於國內法範疇的知識產權為切入點，因此在研究案例上，主要選擇大陸國內一些爭議性事件，如此較易顯現知識產權的作用。此一選擇是因為即使現今知識經濟的國際規範已廣為建立，但發明人的創作成果仍要由各國的知識產權法加以確立、認可，欲繞過知識產權而探討知識經濟對人的意義，將失之空泛。並且，知識經濟的國際規範大多落實於各國的知識產權相關法律之中。又因為大陸尚屬發展中國家，知識經濟的爭議多發生在國內層面，不若已開發國家，已廣泛參與跨國性的知識經濟競爭。

第三，身體已成為現代社會的中心議題之一，這也意味著對身體施壓，意圖建構身體的力量非常之多。現代社會中，身體面對的是多方面的部署。部署身體的力量包括論述、體制、建築形式、規範性決策、法律、行政措施、科學陳述、道德信條等許多異質文本的集合網路，而且這些部署還會隨時改變其作用方式、程式，或派生出一些其他的臨時性部署。⁷²本研究基於研究主題與取徑，關切的是國家建構的知識產權經由網路媒體對身體的作用問題，至於其他的身體部署，或此一有關知識產權的身體部署和其他部署的關係，則有待未來進一步研究。

第四，文化研究途徑基於反本質主義、反還原主義的本體論設定，其特色在批判與解構，主要是對既存事物的重新詮釋，較不能夠建構出具預測能力的普遍通則。但是中國大陸研究在經過極權主義典範、多元主義典範、新制度主義典範、

⁷²龔卓軍，身體部署：梅洛龐蒂與現象學之後（台北：心靈工坊，2006），頁 15-16。

後結構主義典範的摸索後，經常發現源自西方的學理與中國的情境扞格不入，而遭遇研究典範的危機。⁷³因此，文化研究幫助我們重新檢視中國社會，是當前研究工作可行的途徑。也可以經由研究中國的發展，提供新的學術研究視角，建立不同於西方的參考架構。並且經由文化研究也可以幫助我們思考當前文化的邏輯，思考社會當前語境的盲點與限制，這對人們在面對將來生活時還是可以有所啟示。此外，經由文化研究，也可建構出分析文化的策略，有助我們進一步思考當前的文化處境。⁷⁴

第五，本研究試圖呈現討論知識產權的幾種不同論述及其間關係，以見知識經濟時代的身體政治學。但文本與讀者間的關係是複雜多樣的，一方面研究對象處於協力關係網中，不斷受到權力形構，故有無限的解讀方式，其意義永無完熟之日。⁷⁵二方面研究者亦處於另一協力關係網中，不斷受到權力的誘導與制約，協力關係網促使了本文的寫作，但也造成研究者永遠不可能窮盡所有的論述，也就不可能找到對研究對象恒定的解讀方式。是以，本文基於回應研究主題的須要、研究取徑的聚焦，選擇性的解讀幾種論述，並探討其關係，只能視為一種「解讀策略」。終究是一隅之見、一時之思，必然具備有限性與相對性，絕非建立一套「宏大敘事」、「社會規律」。仍有待於對相關課題更多元的探討，更廣泛的對話，才更能發掘解讀身體政治的更多可能性，展現其豐富的意義與啟發。

⁷³黃宗智，「中國研究的規範認識危機：社會經濟史中的悖論現象」，中國研究的規範認識危機（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4），頁 1-38。

李英明，中共研究方法論（台北：揚智文化，1996）。

⁷⁴C. Hann, *Postsocialism: Ideas, Ideologies & Practices in Eurasia* (London: Routledge, 2001), pp. 1-12.

⁷⁵文本意義的浮動問題，將因本研究以網際文本為研究資料而更為明顯。網際文本因為超連結帶來非線性讀寫的特質，以及多媒體帶來圖文並陳的多元內容，這兩個特性，致網際文本的邊界與意涵不易確定，難以對文本意義作出固定的解讀。吳筱玫，網路傳播概論，頁 34-36。